

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深深体会到，侨史学会始终要把“团结促进”四个字放在首位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：衡量侨史学会工作好坏的标准，是看它在学界的团结工作做的如何，对学术研究事业的促进作用发挥得怎样。是不是这样呢？我认为是这样。

利用好侨史学会这个平台

方雄普

(中国侨联)

平台，是时下流行语，意为进行彼此交流和促进本业发展的场所。那么侨史研究的平台是什么呢？我以为就是华侨历史学会了。

尽管华侨出国可以追溯到唐宋以前，但全国性的侨史研究平台只是近三十年才搭建起来的。1981年12月间，全国侨史工作者一百余人会聚北京成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。首任会长为同盟会会员庄希泉，而德高望重的廖公则欣然出任名誉会长，并为学会题写会名。随后，广东、福建、广西、海南、云南、吉林、上海等华侨华人较多的省市，也先后成立了地方性的侨史学会。新中国成立60年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，侨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先后出版了数百部地区史、国别史、专题史、人物传记、论文集、图片集、资料汇编、译著和百科全书，填补了许多空白。究其原因，除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之外，恐怕与侨史学会的组织推动不无关系。

回忆过去是为了着眼未来。为了促进侨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，要做的事情很多，其中重点之一便是利用好侨史学会这个平台。在800字的应景感言中很难对此细说，不过我认为有三点需要考虑：一是要继续办好会刊。因为它既是学会的旗帜，也是培育新人的沃土。二是要礼贤下士，互相包容，广交学界朋友，定期举办多种学术研讨会。以文会友，以友促文，进一步扩大会在国内外的影响。三是与商界联手，逐步创造条件，利用专项基金，对侨史研究的项目启动和著述出版提供一些资助。

学会工作是服务性的工作。办刊组稿改稿，为他人剪裁出嫁时穿着的衣裳，迎来送往，组织研究会，是件搭建平台的苦差事；至于筹措专项基金，那更是成全了别人，难为了自己。所以已故的洪丝丝先生曾经说过，要办好学会，一定要有“扛起闸门让别人过去”的精神。当然，这也并非说自身不能研究。侨史领域虽不是处女地，但伸展的空间比起其他史学还是要大些。由于与有关方面经常接触，说不定还会带来灵感和便利。只要播下种子，勤于耕耘，耐得住寂寞，同样是有收获的。

我曾经在侨史学会工作，现已退休多年。上述体会，借主题笔会之机，仅供同道参考。

欧洲华人社会巨变是欧洲华人研究的强大动力

李明欢

(厦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)

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华诞前夕，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代表团代表200万欧洲华侨华人，赴北京参加盛典。对此我感触良多。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，全欧华侨华人总数不过区区

万余，加之散居在英、法、德、荷、意等十多个国家，更是微不足道。进入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虽然从香港、印尼、印支三国等地辗转移居欧洲的华侨华人有所增加，但处于当时东西方冷战高压下，欧洲华人大多只能局促于当地经济缝隙中艰难谋生，对政治噤若寒蝉。虽然一些祖籍浙江的老华侨怀着对家乡故土的深厚情感，组织了爱国社团，但碍于当时的严酷环境，不仅难以组织公开活动，有些还因此受到迫害。

只有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昂首于世界民族之林，欧洲华人的生存环境才得到根本改善。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，尤其是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一路高歌猛进，推动着欧洲华人社会迈入发展的新时代。大批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源源进入欧洲，为欧洲华人社会注入丰富的人力资源；而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民营企业，则以价廉物美的丰盛产品，灵活多变的运作模式，成为欧洲华人得以崛起于欧洲经济领域的坚强后盾。时至今日，欧洲 200 万华侨华人，4.3 万家中餐馆，800 多侨团组织，340 所华文学校，尤其是遍布全欧主要城市的华商贸易中心，已经如“异军突起”而令欧洲主流社会对其刮目相看。

还记得当我 1989 年第一次在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》发表关于欧洲华人研究的论文时，一位研究华侨华人问题多年的学者问我：“欧洲也有华侨吗？好像从没听说过。”20 年后的今天，再也没有谁会对“欧洲华侨华人”这一命题感到陌生。20 年来，我无数次往返于中国与欧洲之间，在欧洲华人研究领域孜孜探求，既见证了欧洲华人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变，也见证了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》杂志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历程。

现如今，不仅中国学者和欧洲华人华裔学者在关注、研究欧洲华人社会，许多欧洲本土学者也投身于这一领域，并以英、法、德、西等多种文字发表研究成果。1998 年，班国瑞（Gregor Benton）和彭轲（Frank Pieke）共同主编的《欧洲华侨华人》一书出版，成为英语出版物中第一部以欧洲华人为主题的著作，昭示一个新研究领域的诞生。近年来，英国的班国瑞、彭轲、费立民（Flemming Christiansen），法国的卡琳娜·盖哈西莫夫（Carine Guerassimoff），丹麦的朱梅（Mette Thun），匈牙利的聂保臻（Pál Nyíri），西班牙的孙歌迪（Gladys Nieto）、华金·贝尔特兰·安东林（Joaquín Beltrán Antolí），意大利的安东尼拉·西卡诺（Antonella Ceccagno）和德国的卡士登·吉泽（Karsten Giese）等人，形成了欧洲华人研究的本土学者群，活跃于中欧学界。

欧洲学者关于欧洲华人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两大类：一是欧洲华人的国别史研究，近年来的主要著作包括班国瑞的《英国华人》，聂保臻的《欧洲中国新移民：以匈牙利华人社群为例》和孙歌迪的《中国移民在西班牙》等；另一类则为专题研究，主要包括：在跨国主义理论视野下审视欧洲的中国新移民（《跨国华人：福建移民在欧洲》），探讨当代欧洲华人的政治文化认同（《欧洲唐人街：朝向 21 世纪欧洲华人认同观》），从经济视角考察商贸、科技领域的中国新移民（《中国技术移民在欧洲》），以性别理论解读华人女性移民（《中国女性移民在法国》）以及对欧洲非正规移民问题的剖析（《1990 年代的中国非正规移民》、《中国移民入境与目的国选择》）等。

当然，相对于北美和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研究，欧洲华侨华人研究显然还处于起步阶段，而欧洲不同国家之间语言、文化的差异，对有志于该领域研究的中国学者更是极大挑战。然而，由于欧洲华人是一个后起、却处于迅速成长变化中的群体，伴随其成长踏入这一领域的当代研究者们有着十分宽广的发展空间；而且由于当代欧洲华侨华人又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、积极进取的群体，那种驾驭着时代浪潮、求索于东西碰撞之间而多姿多彩的形态，更令研究者们时时享受到在上下求索中与时俱进的乐趣。

回首往昔，欧洲华人社会自身的发展壮大，是欧洲华人研究的强大原动力；展望未来，欧洲华人社会的发展呼唤更多学者为之记录历史，探索问题，共谋中欧人民友好相处、合作共赢的更加美好的明天。